第一卷　童年的回忆

第一章　辛亥风云

一、故乡与身世

雪峰山脉从东北向西南横亘湘中大地。东以衡山著世，西以雪峰闻名；中段的龙山脚下，群山环抱之中，就有我的故乡——新邵太芝庙。老龙潭、鸡公潭灌溉于东北，天马山、狮形山屏障于西南，枫木岭、雷祖寨对峙于左右。山林薮泽，竹木繁茂，田土肥美，旱涝无忧。龙山的矿藏丰富，药材遍野，远近驰名。龙山人勤俭纯朴，性悍好斗。农忙时闻鸡而起，日息而歇；农闲时舞刀弄枪，耍灯戏狮。

我走南闯北，甚或漂泊异邦，总忘不了家乡的山水、老屋与故旧乡亲；魂牵梦系，时刻萦怀。

明、清两代，太芝庙属三溪三都，民国初年称易易乡，后改称长太乡，今属邵阳市新邵县。

我们陈姓祖先于明初从江西泰和迁来此地定居，到我这一代说是第二十二代，实有谱牒坟墓可考者只有十五代，以上几代仅存传说。自迁湘之后，世代行医。

祖父陈玉成（1864－1926），字燠人，辈名宜琢，清附贡生。十七岁进学，两次秋闱未中，第三次中副榜，从此厌倦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甲，便继承父祖医道，并经营永春堂药号。戊戌变法前夕，他协助同乡樊锥组织南学会邵阳分会。该会宗旨是：“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体，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办起，盖兼学会与地方议会的规模焉。”他们奔走于城乡之间，并在太芝庙新院子聚集邵阳一群激进的民主改良派，开展以诗文会友的宣传活动。他们的讲学内容，虽然有的讲政教，有的讲学术，有的讲天文地理，有的讲生理健康等，但基调一致，都是“匡时济世，救国图存，革除旧习，提倡新法，移风易俗，振兴中华”。祖父负责推销南学会的宣传刊物《湘报》。《湘报》的创办“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发表了不少提倡维新变法的论著。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查禁南学会，吾祖便于 1898 年偕樊锥、石公甫等赴金陵（南京），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得到刘的资助。他个人于次年春节后，先赴日本留学。从 1899 至 1907 年（清光绪二十五至三十三年）先后在东京商业专科、千叶医科、明治大学警政科、法政大学特科就学，几近九年。因其赴日时间早，留日时间长，当时邵阳籍许多赴日留学者都是受他的影响而去的，如樊锥、唐[illegible]、肖坤、石广权、李笏山、刘幸刚、刘馥、岳卓如以及太芝庙的陈整、陈纯如、陈卓甫等。他在东京与黄兴、杨度、秦力山交往较多，参加过秦力山组织的正气会，是青年会的筹办人，又是湖南留日同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与杨度在法政特科同班，并相约学法政的不参加政党组织；但又资助过黄兴，《民报》募捐他也捐钱。他既与同盟会员有交情，又与保皇立宪派有来往，但终其身未参加任何政党。

1907年秋，祖父回国后应蔡锷之邀赴广西，先任柳州监考官，继调庆远府（今桂林）巡警教练所所长。辛亥革命时，返太芝庙家乡首倡兴学，并号召毁神，剪辫子。随又应蔡锷之

邀赴云南，先后担任云南都督府医官，昆明、大理县丞。蔡锷逝世后返湘，应门生唐𠊎、刘武之邀，边行医边从政，先后任零陵厘金局长，永州烟酒公卖局长，湖南陆地测量局医官，陆军第一师军医正，湖南铜元局总务课长，溆浦、长沙、湘阴、南县警察所长。1926 年秋，因受病人传染而逝世于南县任所，享年六十二岁。遗书其孙新民、新宪兄弟云：“尔辈既不生于六十年前，又不生于六十年后，时代赋于尔辈之使命重而且大，当今应速求南北之统一，谋国家民族之富强，兴教育以启民智，举实业以裕民生，内修政治，外御强权。吾老矣，无能为也,尔辈其勉之 毗嘱。”

父亲陈治（1884－1944），字焕文，号润生，辈名诗诵。在太芝庙读了几年私塾，十三岁便继续在恒春堂协其伯父宜瑛经营药店。十八岁成婚后，立志振兴永春堂家业，得到外祖父的支持，除了卖药之外，兼营杂货、布匹，随后又宰猪、蒸酒、打豆腐。父亲善于交际，利用弹琴吹唱，常聚集一些人来店谈古说今。不几年，永春堂不但生意兴隆，而且成为太芝庙群众聚会的场所，日夜笙歌不绝。可是好景不长，从 1903 年至 1909 年，母亲连生我兄弟姊妹五人。1910 年祖母去世，二哥夭殇，次年母亲又病故。家庭连遭巨变，父亲深感独力难支，只得舍女（让人抱去做童养媳）寄子（托亲人抚养），随祖父外出谋生。好在父亲从小练就一手蝇头小楷，便从文书工作干起。1914 年，得保荐担任江华马头铺厘金局稽查员，1916 年调任双牌厘金局长。次年续弦，娶零陵何桂英为继室，并于是年将我兄弟二人接去双牌上学。 1919 年调任零陵厘金总局总稽查，1922 年调任冷水滩厘金局长，随又先后任宁远县盐税局长、宁远县知事公署科长。1924 年调任两湖米捐局主任兼总稽查。是年冬，应戴岳电邀间关赴粤，先后任广东湘

军第二师和炮工兵督练处军需主任。第一次北伐，随军赴江西任上猷县县长。1926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上校经理处长兼兵站站长，参加北伐，与师党代表肖劲光相友善，随军转战湘、赣、皖、苏及鄂西宜昌、沙市一带。 1927 年“四 一二”事变后，宁汉分裂，随又合流。 1929 年因部队整编而去职，改任湖北松滋县财政局长。不久，贺龙率红军攻占县城，父亲未能逃出，而被红军俘虏留用，任文书，跟随红军转战鄂西北一带。终因受不得艰苦考验，染上疟疾。经鄂西苏区政治部主任陈协平同意被遣送回湘，闲居长沙。1932 年，父亲堂兄陈整被任命为缙云县县长，强邀其赴任财政科长。抗战之后，京、芜沦陷，乃辞职携眷返家乡闲居，其时对修堤、建桥、筑路、兴学都乐为之倡助。1944 年，日寇进犯新邵，父亲在逃难中因跌跤中风病逝于龙山故里，终年六十有一。

生母李桂英（1886－1911），本村李用九先生之女，幼聪慧，长贤淑，十六岁与我父亲成婚，七年连生我兄弟姊妹五人，其中次兄早殇，抚养之劳集于一身，还需侍奉长年患病的祖母。1910 年祖母逝世后，母亲积劳，亦患不治之症，于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与世长辞，年仅二十五岁。

继母何桂英，零陵农村贫农女子，秉性慈善，勤劳俭朴，视我兄弟姊妹为己出，尤对我一生的学习、事业支持甚大。对人不论贫弱都好施德，属典型的贤妻良母，于 1972 年离别人间，享年七十五岁。

我出生于 1907 年 12 月 7 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农历十一月初三日）。从 1912 年下半年至 1913 年下半年，算是接受了学前教育，因为当时学校就设在我家里。我开始跟着在校学生唱歌、游戏、做体操，随后就学读“人、手、足、刀、尺”。我姑母以前读过几年私塾，字也写得端正秀丽，这时就辅导我

兄弟俩识字。春节后我和哥哥新民都进私塾，始读“四书”，从“学而第一”发蒙。其时，原来的甲、乙两班迁太芝庙庙里上课，后来叫高等班；丙、丁两班仍留在我家里上课。由于几个留日学生先后外出作官去了，这时学堂的老师便都改聘当地的秀才和廪生担任。开始收学米（代学费），还要学生送菜。教学内容也都改读”四书”、“五经”,只不过设有体操和唱歌罢了。我在这里一直读到 1916 年冬。

二、打菩萨、剪辫子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全国人民额手称庆，各地有影响的人物纷纷起来，揭竿称雄。城里的知府、知县都逃跑了，革命党人选出了新的都督、副都督。不久又听说城里的都督走的走，逃的逃，也有被杀的，这时我父亲忧心如焚，既担心祖父在广西的生命安全，又面临我生母和祖母都停棺在堂。我们兄弟姊妹四人，最大的未满八岁，最小的仅一岁半。幸喜我祖父这时卸任归来。接着堂伯父陈整和堂兄陈纯如也相继归来。他们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太芝庙内大小菩萨打倒并点火烧了；第二件事就是剪辫子；第三件事就是兴办学堂。他们烧菩萨时我随着哥哥和邻近的孩子们一道去看热闹。他们聚集一批年轻的读书人将庙里的大小菩萨打得干干净净，泥塑的都被砸碎在地，木雕的也被劈得断手裂足。对前殿四座大菩萨，有人用梯子爬上去用长绳子套着，许多人一声嘿呵嘿呵便拉倒在地。接着，把打翻的木菩萨搬到庙坪里放火焚烧。这对，跟来看热闹的孩子们每人抢一份，我也拣得一条檀木小菩萨的脚回家。

堂伯兄们一伙人烧了菩萨后，又互相剪辫子。以后每天有若干人站在岔路口和桥头，遇到拖辫子的男人便剪，有的乖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地被剪掉了，有的双手抱头就跑，有的苦苦哀求，也有的抱怨反抗。我父亲却借故拖延不剪，挨了我祖父的申斥后便走到祖宗牌位前跪着，是边哭边让人剪的。

接着，堂伯兄又结伴到邵阳县城去了一趟。回来过春节时，大家又议论起办学堂和成立狮灯会的事。当时我祖父说话飞灵的，说做就做。首先要我父亲将永春堂准备收场，将两排正屋拨归学校作教室，自己家里人住横屋，前面大坪作操场，指定我堂伯陈尔翼当堂长，堂兄陈纯如任体育教习，堂伯陈卓六任国文教习。可说是留日学生包办了太芝庙新兴的洋学堂。学校开始叫三溪乡文德保初等小学堂，随又成立高等小学堂于太芝庙，堂址设在庙里。民国二年改名易易乡两等小学堂，学制七年，初等四年，高等三年。校长和教员都尽义务，不拿薪俸。大家凑钱买笔墨和《湘报》发给每个学生一份，学龄儿童不论贫富都进了洋学堂。民国元年正月十八日正式开学，在我家里晒谷坪举行开学典礼。首先由日本士官生陈纯如教学生进行队列姿势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左转、开步走。随又教唱军歌——从军乐。第二天开始教课文，因为新教材未到，仍以《三字经》作启蒙课本，便由先生讲，学生听。

狮灯会于正月初二正式成立。从初二晚就集合了文德保的玩灯者在老院子德星堂开始舞狮子。每家自备灯笼，来一个人参加；可多来，但不能少于一人。每到一家，首先是跳三星——福、禄、寿（各用一人带着福、禄、寿星面具在中堂上跳一番加官祝福），接着舞狮子，伴随着的有孙猴子、猪八戒、沙和尚，他们都围着狮子跳；跳狮子的要接受引球铃者的指挥。舞了狮子，就表演武术，最后唱赞歌（又叫龙灯歌）。同时主持人端着茶盆将事先准备好的米两升，红包一个，送给被贺的主人。主人接到茶盆，应将礼金加倍回赠灯会主持人并

唱赞歌、放鞭炮欢送出门。玩狮灯的时间常以放鞭炮多少和唱赞歌输赢为定。每年狮灯玩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到我家永春堂收灯，第二天算账聚餐。每年由天、拨两房（即世字辈的天粹和拨粹）各选一位辈份高的主其事。

当时太芝庙的社会风气又开始复旧。如原来我家永春堂、隔壁老院子德星堂和对河新院子，三家大门上的横联都是“革故鼎新”；现在都改为“皇恩浩荡”。原来春节的年画是孙文、黄兴、黎元洪的半身画像，这时只有袁世凯、老鼠嫁女，门神仍是秦叔宝和尉迟恭，赵公元帅都贴在主堂上“天地君亲师”神位下面。早两年留日学生提倡的点头、鞠躬，也恢复为长揖跪拜。连货币也改变了，出现民国三年铸造的袁大头银元，被称为光洋，可换铜元壹仟文。原来的龙头银元（清光绪年间制造的）与外来墨西哥银元都称常洋，只换铜元九百文。有的符记多的凹版银元，只能换八五折。一般老百姓常使用的是当二十文的铜元和有四方孔的缗钱（缗钱又叫制钱），一千制钱叫一吊，或叫一串。

第二章　龙山暴动

1916 年秋，龙山矿区工人与太芝庙附近约三十里内的农民联合举行大暴动，火烧各矿山公司，打散矿警，烧死“广益福”公司经理，震惊省内外。我当时正在太芝庙陈氏宗祠读经馆，亲眼目睹这一暴动的演变情况，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会在龙山矿区发生这一声势浩大的工农暴动？可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远在前清光绪年间（约为戊戌变法时期），有湘乡杨家滩（现属涟源）人来开矿，随之而来的约数十家，经过十余年大鱼吃小鱼的互相兼并，到民国初年，就只剩下几家在苟延残喘了。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各帝国主义无暇顾及远东，我国民族工业有所发展，尤其矿业更是黄金时代，龙山锑矿也应运而兴。这时矿砂价格陡涨，资本家趁机发了横财，但他们对工人越发进行残酷的剥削，对附近农民更是任意欺压。这次暴动的直接诱发原因是矿警枪杀了太芝庙白杨坳捡砂农民和污辱捡砂妇女。由于矿山各公司开采的矿砂堆满龙山矿区各洞口，每到夏季洪水暴发，矿砂常被冲下山来，随着暴涨的涧流冲到太芝庙垅间，远的流到大江边、山底下一带，洪水退后，老百姓便纷纷在自己屋门附近捡砂。随着时间的推移，捡砂的农民越来越多，太芝庙的生意人便筹资在淡家园建土炉冶炼矿砂。捡砂人所捡的砂当天就可卖给冶炼商。这时太芝庙的小商小贩和开伙铺的多起来了。原来这里只有庙前周旺一家伙铺，这时隔

河两岸出现上十家伙铺。至于卖茶水点心的，开始用一条凳，随之是沿途搭棚子卖米豆腐、包子、饺子、面条等。平时太芝庙除正月玩灯外，晚上是阴雾沉沉；而这时灯笼火把彻夜通明，犬吠之声不绝于耳，附近各乡人们都赠给太芝庙一个雅号——“小南京”。

确实，太芝庙当时出现了一阵繁荣景象。可是好景不长：先是矿山资本家雇用了三十人枪组织矿警队，在矿山上下巡逻，阻止农民到接近矿区的枫梓庙捡矿砂；接着禁止在山脚下太芝庙一带捡矿砂，随又派武装矿警到太芝庙挨户搜砂，发现哪家有砂便没收，二道贩子所囤积的矿砂也被抄走。这就引起太芝庙人民的普遍不满。更有甚者：矿警经常侮辱捡砂妇女，鞭打捡砂的人，抢夺捡砂人的背篓，使农民的反抗意识日益强烈。

1915 年暑假，我和哥哥一道随着一长串捡砂人到枫梓庙去捡砂，刚走到“利盛华”门口，便看见一大队捡砂的被矿警追赶飞奔而来。我们这一队前面有几个“冲天鬼”，看到矿警没有带枪，手里只有鞭子，便吩咐我们小孩和妇女向山上躲藏，三十个青壮年随着“冲天鬼”冲上前去，拦住几个矿警质问要干什么。因为我们捡砂的都随身带有一把秧锄，矿警也知道秧锄比马鞭子厉害，便佯装吼着：“不准到前面去捡砂！”这时躲在山上的人丢出几块小石头，打中一个矿警的面孔，接着山坡上的娃娃们都呐喊起来，一个接一个的石块向矿警打去。我和哥哥原在表舅家暂避。这时表舅一家人都出来看热闹，我们也跟着站在大门口。我和哥哥也捡起石头向大路上的矿警扔去。虽然没有命中，但总算出了一口闷气。于是所有捡砂的人都以胜利者的喜悦继续下河捡砂，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太芝庙。从此以后，我兄弟俩都不愿意上山砍柴放牛，而乐意去捡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象这种斗争场面，尔后又经历过若干次。由于司空见惯，我们的胆量也更大了。我当时捡砂每天最少可赚二百文，哥哥的比我还多。二百文当时可买四升米，一百斤柴只值一升半米。砍柴虽近，但我一次只能挑二十来斤，因此，我姑母也乐意我们假期去捡砂。

这年下学期，我和哥哥都在新桥江伯父家读书。大约是在中秋、重阳之间，龙山的风暴揭开了序幕。白杨坳一位捡砂农民，为维护捡砂妇女免遭侮辱，竟被矿警开枪打死，尸体被抛到太芝庙新桥江沙滩上，也正是我伯父恒春堂门外。一时全乡轰动了，大家睹此惨状，异常悲愤！因死者正是太芝庙金家湾同房人，也是我们同大龙公的亲房。我伯父陈焕林当即联合陈氏的头面人物到宝庆县城告状，请官府验尸。谁知宝庆县衙门不是派人来验尸，反而派警备队到太芝庙来镇压农民捡砂。原来是龙山矿区资本家已抢先到宝庆县衙门告状，说什么山上的矿砂被太芝庙刁民抢光，要求派警备队镇压。这样，原告反被打成被告，警备队天天到各户去搜砂，并宣称奉令捉拿首要分子。当时在太芝庙捡砂的都是当天捡当天卖，只有二道贩子收藏有砂。他们趁机都在夜间将砂用竹篓装着沉到塘里，或埋在红薯窖里。冶炼厂是在县衙门立了案的，这时因无货源被迫停业，也就无砂可炼了。警备队在太芝庙骚扰了一段时间，捡砂的也停了一段时间。老百姓天天还要向警备队送米、送柴、送菜、送猪肉。妇女吓得不敢出门，冶炼厂熄了炉，饮食店、伙铺也歇了业，晚上连灯都不敢点了，“小南京”的虚假繁荣消失了，整个太芝庙被恐怖阴云笼罩。人们怨声载道，暗地里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1916年春节前后，太芝庙几个大院子里都开始请把式（武术师的别称）开场练武。我姑父李德贵系潭府人，民国初

年随我姑母来到太芝庙抚养我兄弟二人。他是佃农，佃租对门新院子陈吉生兄弟的几亩田，种着我们家的园子，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整天都在田土里劳动。我和哥哥都上学，早晚散学时间帮助放牧租来的一条黄牯牛。好在那时屋后有草，屋前有水。我祖父在外从不寄钱回家；父亲工资低，过年过节有几元钱补助我姑父，他全家也算混得过去。当时他从潭府请了一位拳师来我家“永春堂”，其名是教狮灯会的武术，实际上是教夺枪和擒人的本领。参加练武的都是金家湾（现社中村）的青壮年农民。春节期间，利用玩灯进行暗地串连。这时太芝庙一带农民并没有人去矿山脚下捡砂，山上资本家认为经过武装镇压，附近“刁民”都驯服了。他们在黄金梦中欢庆太平，施恩矿警，并抬着猪、挂着鱼，封着银元，送走了县警备队。

一个风和日暖的早晨，太芝庙突然吹起了牛角，敲响了铜锣，接着，附近三十里内的青壮年农民都聚集在太芝庙沙坪里，二十多个拳师领队，约有近万人分三路直奔龙山矿区。后来听说，农民到了矿山，山上矿工就带路，一边放火烧公司厂房，一边捉公司经理老板，惩罚了那些为虎作伥的工头，缴了一部分矿警的枪，捣毁了一些设备，也掠了一部分公司财物。一个民愤较大的经理李某，先躲在窖洞里，后被捉着投进烈火中烧死。他的肚腹肥胖，没有烧透，后被浇上煤油才烧光。奇怪的是全矿山武装矿警纷纷弃械逃跑，并未开枪射击，故这次暴动以未伤亡一个农民而胜利结束。

当时，走在暴动队伍最前面的是谭府十把式。他姓李，与我姑父是同房兄弟。个子矮瘦，能跃身飞过两米多的高墙。他挂着一副流线，背负一对铁铡。流线一甩可擒拿对方武器，也可套拴对方头颈。这次他就活擒了一个矿警，带到太芝庙祠堂用禾桶罩了一夜就放了。他在“永春堂”教过武术，是当时武

林中的一位能人。但他平时从不轻易对人动手，吃亏挨骂常一笑置之。这次暴动，他和其他把式一样，对财物均未沾边。大概都出于江湖义气，激于义愤而拔刀相助吧。参加这次暴动的群众，除太芝庙田垅里的各村农民外，还有李枣园、黄泥洞、牛头冲、马家岭、莫家冲、烟子坑、谭家湾、大江边、山底下、谭府、冰塘、白杨坳、扶锡一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有过去哥老会的，也有贺金声起义失败的余众。其策动者为谁？后来传说不一。有说是太芝庙和白杨坳几个穷教书匠发动的；从敌对方面指名要捉拿的首要分子看，则是禾歌垴（现新禾村）正五爷的两个儿子。正五爷叫陈正生，原来教过私塾，后来双目失明闲居在家。他有三个儿子，均身材魁伟。大的名养吾，人称吾长子；次子名守吾，人称七长子；三子名帅吾，人称满长子。吾长子和七长子参加这次暴动，随把式走在前面，在矿山斗争中大显身手。满长子那时还只有十几岁，跟着去凑热闹。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不少英勇斗争的故事，涌现出许多无名英雄，如金家湾的麻十爷和桂五爷，莫家冲的莫如卿和莫卫卿兄弟等。

龙山暴动后，当地农民并没有考虑什么后果，大家认为出了一口气也就心满意足了。当天散伙，第二天照常到地里干活。过了不长时间，就谣传矿山派兵来捉人，还说什么省里要派兵来血洗太芝庙；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弄得人心惶惶。出头的人开始远走他乡了。

这一年，我与哥哥都在太芝庙陈氏宗祠读书，老师是白杨坳的陈锦春先生。一天，刚放学，我们还在归途中，看见一队兵勇打着旗、吹着号，从庙边奔来淡茶园，进驻陈氏宗祠。老师当即从祠堂侧门逃回白杨坳。我们都站在大门口观动静。这些兵勇刚到祠堂不久，即在大门安置哨兵。有位山底下姓李的

锯木工人（人称七锯匠），从祠堂前面大路经过，停步向祠堂看了一眼，便被哨兵喊住，随即将他关起来。当天这队兵勇就将淡茶园老百姓一条猪杀了，尔后除每天勒索油、盐、茶、柴、米和鸡、鸭、鱼、肉外，还借搜矿砂之名，挨家挨户抄家，见值钱的东西就拿。他们捉拿“首要”未获，便将陈正生抓进祠堂吊起，限族上房亲将养吾和守吾交出；并扬言到期不交人，将血洗三十里。是时，太芝庙完全被恐怖所笼罩，搞得鸡犬不宁。一到傍晚，人们便上山躲藏。白天看到兵勇出门便准备上山。在逃难中，我兄弟俩几次跌进山沟里，我的头部几处受伤，鲜血染透衣衫，至今尚有伤疤留存头部印堂和后脑。这些被资本家雇来的兵勇，在太芝庙勒索抢掠十余日，便将陈正生和七锯匠二人用马刀砍死于陈氏宗祠门口。陈正生临刑时高呼；“苍天！苍天！”七锯匠临刑时面对屠刀蹦跳着狂呼：“冤枉 冤枉!”这些失掉人性的刽子手,还将他二人的头割下用篾箕挑走。走到庙面前还把周旺铺子和贺家院子放火烧毁，到禾歌垴又将陈正生所住大院子放火烧掉。他们还不断鸣枪示威，不准人去救火。但金家湾、荷叶湾、淡茶园、斋头湾、新桥江一带未外逃的老百姓，均齐奔现场救火。但终因三个院子不靠河边，均被烧光，并殃及邻居。

这次暴动结果，受损失最大的是太芝庙人民。许多人弄得妻离子散，有的死在外乡，有的流离失所不知所终；远者逃云、贵、川，近者避长沙、永州，也有逃返江西泰和老家的。据我所知，当时到永州找我祖父和父亲的就有几十人，包括吾长子和七长子兄弟。吾长子在我父亲身边多年，后来娶了一个能武术的女子，夫妻活到解放后六、七十年代才逝世。七长子经我祖父介绍在零陵镇守使当兵，不一年当上排长，1918 年随刘建藩攻打北洋军阀张敬尧，在株洲附近战死。满长子则不

知所终。当时军阀混战，逃出当兵的多，一直归不得家的不少。从另一方面说，这次暴动又教育了太芝庙乡人民，初步认识到资本家与军阀勾结的残酷本性，接连掀起反抗风暴。到大革命时期，太芝庙的工农群众率先成立农民协会和龙山矿工会，原来远逃的这时又纷纷回到家乡。可是，龙山陈容和却利用这次暴动发了横财。他趁矿山被捣毁之机，以股东身份兼并其他公司，连他亲家李某（被烧死的经理）的公司股份也被其吞并。原来几个大公司——广益福、鼎丰、福记、天禄，被合并成福禄公司，陈容和当经理。同时，他将矿山暴动被抛弃的枪枝暗藏起来，作为自己保家之用，接着成立矿警所，自任所长；随又任易易乡团防分局长。大革命时期，他被工农群众捕获，押解到宝庆城时脱逃。马日事变后，他又卷土重来，担任五区联防局长，疯狂镇压工农革命。抗战时期，他兼并游杂部队和各股土匪，又凭借武力担任清剿指挥，独占龙山矿厂和纸槽，成为龙山一霸，人称龙山寨王。解放后，在被押解公审途中畏罪投河自尽。

第三章　潇湘逐浪

一、奔走永州

1917 年春节期间(约农历正月初八),我与哥哥新民在陈致和与李光庭的陪同下，奔赴永州。在离开家乡太芝庙时，参加送行的，除抚养我们兄弟的姑父姑母一家外，还有我的外祖父、舅父、表哥、大姐及金家湾房亲长辈们；他们后面又尾随着一大批娃娃，还有我兄弟俩的同窗好友。经过荷叶湾到狮子山，从谭家湾迎面来了两条飞舞的龙灯，伴随着锣鼓旗伞，鞭炮响彻云霄。我外祖父高兴地说“好兆头!”我姑母原来边送边流泪,这时也不断地说“今天好得很!”当时我呢,回头望祠堂，接着望庙边学校，再望我的家永春堂，竟望不到大门两侧的梨子树和枇杷树。想起在这两棵树上我每年夏季爬上爬下的情景，竟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五天后，我们到了永州。这时，我祖父在永州任湖南省第五区烟酒公卖局局长，父亲任零陵厘金局双牌分卡主任。这是辛亥革命后全家第二次团聚。我们祖孙三代四人都是男性，祖父已年过半百表示不再继娶；父亲时年 33 岁，为照顾我兄弟俩，又奉父命迎来继母何桂英。不久，祖父交卸烟酒公卖局长职而赴长沙，我与哥哥随父亲和继母赴双牌住所。在双牌读了一期私塾，一年小学。在小学这一年里，两度到离双牌约十里的卢家冲躲兵灾。

1918 年秋，我与哥哥随继母迁居永州城内，住在北门朱

人人公馆。所谓朱大人，在前清做过提督，遗下一栋有百间房子的大院子，从前面双拱门到后堂，都用巨石砌成地面、石级和内外围墙，木结构住室也用红檀木作柱门，南北两戏台雕龙绘凤金碧辉煌。据说朱提督生前营造这座大院时对人说道：“我的山林田土，子孙可以卖掉；这样的大院子有谁买得起？”他没有料到我们住进他第九个孙子的房屋时，已有三个孙子将自己的住房拆卸变卖了，有的搬到戏台上去住了。尽管街坊邻居还有称某老爷的，但其人早已穿空心破棉袄、拖无底鞋了。我父亲常感叹地对我们兄弟说：一代作官，九代变牛。他们为什么败得这么快？我父亲当时也只认为是嫖赌吃鸦片的结果，我当时更不理解。父亲常以道州何氏和永州朱氏子孙丧德不学来教训我们，不准吃烟喝酒；他自己常打牌，但不准我们在场观看。他跟我继母感情很好，虽身在官场，但从不涉足青楼。故他对僚属亦要求不进娼门，不吸鸦片。他身边一个公丁，是家乡人，又是我祖父推荐的，在双牌染上烟瘾，终被遣送回家乡。他常对我兄弟俩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希望我们认真读书。父愿子成龙。我在双牌小学读四年级时，上学期获全班第二名，下学期因跌断手耽误学习降到第七名，挨了父亲一顿重重的惩罚。到永州后，我们兄弟俩都同时进了濂溪书院。

濂溪书院当时在湖南颇有名气。永州所属八县——零陵、祁阳、东安、道县、宁远、永明、江华、新田的学龄儿童，以进濂溪书院为荣。学校分高、初两等，校风和学风都很好。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初小要读六年，方能升上高等小学。经过考试，我插入初等六年级，哥哥考入高等一年级。次年，我再度参加考试，升入高等一年级。这时，学校更名为永州第一高等小学堂。开设十一门课，即国文、英文、算术、修身、博物（含动、植、矿物）、历史、地理、音乐、体操、图画、手工，

以学现代科学知识为主。校长曹昌明，系前清廪生，又是湖南优级师范毕业。学校的老师半是优级师范毕业，半是衡阳三师毕业；国文教员有一位是前清癸卯科翰林。学生进入高等小学堂，全部寄宿。学生年龄大的有二十四、五岁；我和另外两名最小，约十二、三岁。每天上课六、七节，早、晚自习。上课、自习、就寝，都有学监检查。学校管理很严，出校门要请假，星期日放假出外，也要在传达室翻自己的名字牌子。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如国文教员唐翰林，教学两年，除一位高材生唐鉴因成绩特优外，没有一个不被他用铁尺打手心的。他的记分标准也特别：他先后任教两个班，只有唐鉴一人的文章打过 30 分，其他多为 10 分、20 分，甚至零分、5 分的。他说：只有状元文章打 100 分，翰林文章 90 分，进士文章 80 分，举人文章 60－70 分，拔贡文章 40－50 分，秀才文章最好的 30分。你们写的算童生文章，最好的只能得 20分。所以我的作文也都在 20 分上下。最后，他被湘军都督谭延闿请去当顾问（他与谭延闿是同科翰林）。临行前，他在我班出一道自选题，学生大多写的是感谢、欢送、惜别之类。我写的题目是《翰林的威风》。他看了之后，叫我到休息室当面批改，他拿来笔将“风”字改为“仪”字，便成了《翰林的威仪》。随即圈点，破天荒给我 28 分，并批“传观”；我自然很高兴。因我在文章里将他的威风刻画出来：他坐绿呢大轿，后面一对扁灯笼，上书“钦点翰林”字样；他到大堂下轿，还须校长亲自揭开轿门帘方才出来；校长跟随他一步一趋地送进教室。我的文章迎合了他的自矜心理，所以赏赐了我一次秀才分数。我作论说文，特别是学作策论，确实从唐翰林那里受益不小；但我初学格律诗，却被他挫伤积极性，至今尚存不快。记得我写的一首五绝中有一句“革故又鼎新”，他以“鼎”字不合平仄而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